

校长面对面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双一流”建设须回归教育本源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双一流”几乎是每一位高教领域的代表委员必谈的话题。这并不奇怪,因为自2015年底被提出至今,“双一流”已经成了高等教育人士思考未来发展时,所面对的最大命题。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双一流”,不同的人也会给出不同的解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也谈到了他所理解的“双一流”。那么,面对“双一流”,这位高校掌门人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解读呢?

“双一流”是高等教育的整体规划

“必须肯定,‘双一流’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这是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在采访中,王树国对“双一流”战略的提出给予了很高评价。

王树国谈到,大学是先进思想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应该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主动思考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意义,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做出贡献。

“大学关心谁能进入首批‘双一流’名单很正常,毕竟这关系着高校自身的发展。”但在王树国看来,大学的领导者更应该站在国家的角度看待“双一流”。这不是哪所大学单独的问题,更不是哪所大学能率先进入一流的问题,而是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高等教育也要率先走近舞台中心,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整体面对世界竞争的问题。

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对媒体表示,“双一流”名单由政府根据高校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比选确定,实行动态筛选,不搞终身制和身份固化。在王树国看来,这段话正在试图将社会舆论拉回正确的轨道。“不要过分关注名单,关键还是看你是否持续为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树国强调,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双一流”不是某个学校的计划,而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你的贡献在哪里?这才是考验大学真本事的时候。因此,此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短板在何处,需要解放的思想关键点又在哪里。”他说。

“后配给”带来科研新秩序

也正是吸取了之前资源分配方式的一些教训,自2016年起,西安交通大学在不同学院的资金分配上,实行了“后配给”制度。

“在此之前,各学院的经费需要每年提前向学校申报预算,再由学校进行论证来确定,学院按照论证后的计划实施。但后配给制则是学校根据各学院上一年的工作业绩增量,以及各学科与



国内高校兄弟学科的增量对比,下拨一定量的经费到学院,这笔钱完全由学院自主支配。”王树国说,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促使各学院不再专注于每年可以得到多少经费,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将本职工作做好。

“因为经费的事情不用操心,只要工作做好了,相应的支持就会到位。”王树国希望“双一流”建设也是这样的。“高校不要太多关注能不能进入名单,只要能取得大的进步,国家自然会把资源配给下来。如果形成这样的机制,大家就不会为一份名单而绞尽脑汁了。”

后配给制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促进不同高校的个性化发展。“每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这是我们搞评估体系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王树国说,而后配给制度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文科类大学可以讲它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贡献,理工类高校可以讲它们在理工领域的贡献,只要讲出来,就能获得相对应的资源。”

王树国特别强调,在这种模式下,一定要特别关注新兴学科的发展。这类学科虽然所占比重小,论文发表量、科研成果与老牌学科比也有较大差距,但它们一般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大力支持。

此外,这种制度也不是“撒胡椒面”,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做后配给。“西安交大也不是全部实行后配给制,很多工作还需要进行统筹,但也

国民经济主战场。对于这“三个面向”,王树国深以为然。

“大学需要一场变革,而且不是一般力度的变革。大学要真正和社会融为一体,引领社会发展。一所学校是不是一流大学,关键看这所学校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中能否做出一流的贡献,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王树国说。

“顶天”“立地”是一个过程

每当谈到高校对社会的贡献,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贡献时,人们通常爱用到的两个词便是“顶天”和“立地”。其中,“顶天”代表的是对前沿基础科学的探索,而“立地”则代表了对应用学科的探索。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两条几乎没有交集的“平行线”,然而王树国却并不这么看。

“‘顶天’和‘立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任何科研人员来说,并不能一下就顶到天,当然也不能一下子落到地。”他说。

2016年底,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产业化项目——“煤炭超临界水气化制氢发电多联产技术”项目产业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超临界水蒸煤”技术逐步迈向产业化。

“这一项目的负责人郭烈锦教授从事超临界水研究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开始时也只是从事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积累,当基础研究有了一定成绩和国际知名度后,他们开始小范围地落地试验,试验成功后,他们才在之前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产业化。这就是一个从‘顶天’到‘立地’的完整过程。”王树国说。

他表示,从科研人员的成长角度说,开始时一定要从事基础研究,当积累一定程度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能提出独立的课题了。但要提出好的课题,就必须了解社会需求。此时,科研人员便会自觉地开始关注应用,而当他们的课题终于应用时,成果也就自然落地了。

“‘顶天立地’是一个整体成果,不是个人的成果。一所学校一定要有的成果‘顶天’,有的成果‘立地’,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王树国说。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系统中,大量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了“顶天”的一端,而对于“立地”端是缺乏规划的。“其实有很多教授有很好的项目,完全可以落地,但因为我们的‘指挥棒’并不倾向于此,这就导致了科研人员在完成基础研究后,并不是顺理成章地探索技术应用,而是转向其他研究。毕竟,‘顶天’项目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头衔。”

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拨款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激励措施。“希望政策能发挥激励作用,引导高校的科研成果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实质性贡献。”王树国说。

海峰随笔

为高考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即将出版

■刘海峰

高考是我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高考改革不仅关系到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的维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到宏大的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关系到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高考改革事关教育全局,已成为重大的民生议题,而且是教育领域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受到民众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2012年7月,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需要专门成立一个国家级决策咨询机构来指导高考改革实践,说明招生改革意义非常重大,也非常重要。2014年9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文件。以往也不断有关于高考的各种各样的改革,但多数都是单项的或者某一个侧面的改革,而这次涉及到考试招生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顶层设计的系统改革,标志高考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高考既有与世界各国相同的规律,也有不少独有的现象和问题。

长期以来,高考制度总体而言是“三多三少”,即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分析相对较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观,特别是2012年前后讨论并地高考政策问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以后,出现研究高考改革的热潮。但是,对整套高考制度的系统研究还是很少,尤其缺少真正有分量的高考改革研究著作。

高考改革是一个谁都说得上的双向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要谈自己关于高考改革的观点,发表一两篇文章不难,而要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不重复的系列论文或出版专著却很难。为了将高考研究推向深入,并为现实基础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非常必要。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一直将高考改革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和专著,研究成果为全国和部分省市的高考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本丛书是中国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对高考制度从理论、制度、政策、法治、内容、形式,到招生考试的区域公平、民族政策、效度和评价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同时对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做专题研究。既对高考制度进行理论探讨,又对高考改革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本丛书共22本,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内到国外,对高考制度及其改革予以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一个规模、成体系、成气候的书系。

本丛书基本上由笔者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构成,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笔者历年指导的众多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中,以高考研究为选题的占大多数。要想真正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我们的研究应建立在对照考试历史与现实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为了使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至于陷入空谈,笔者总是要求博士生多了解高考实际。多年来,以高考为选题的博士生一般都要到部分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等考试机构实习,真正深入到招生考试第一线,多与考试管理工作接触交流,才会不书生气,所写论文才能脚踏实地。凡是研究国内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博士,都通晓两国的语言文字,并尽可能到研究对象国去搜集资料和实地调研,多位博士都在研究对象国留学多年或访问研究一年以上时间。

丛书每本著作各有专攻,希望都能切中肯綮,真正做到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对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对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行,进而对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相信本丛书的出版能够为高考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为完善我国招生考试制度贡献绵薄之力,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深感欣慰。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书影

壹月数评

大学花10亿元 打造“皇宫”校区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靖安校区的建筑十分雄伟,装潢和古代皇宫类似。该校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学校花费10亿元之巨,将校区建设成仿古模式,主要是通过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把校区打造成为一个亮点来供学生艺术写生和培训。

向学生展示传统文化无疑是正确的,把校区打造成供学生写生和培训的亮点也无可指责,但凡事都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当所有这些除以一个10亿元的“分母”后,是否显得“性价比”就太低了呢?

近几年,高校兴建新校区的热情一直没有下降,各种类型和形态的新校区也层出不穷,其中饱受指责的也有不少。

这些指责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花大钱搞“面子工程”,不注重真正的校园文化建设。要知道,真正的校园文化建设一方面要立足于学校本身的定位展示学校特色,同时贴近学生的生活,唤醒学生内心的感受。而红墙绿瓦的古代建筑是否与“交通大学”的定位吻合,又是否能贴近学生的内心?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靖安校区

76.71%学生 考过或想考研

本月初,一项网络调查显示,高校中有76.71%的受访者表示已参加过研究生考试或打算考研。

对于如此高的考研率,该调查分析将原因归结为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因此,获得本科学历的人也越来越多,其竞争力也自然下降,促使学生追求更高层次。

对此,笔者有些不同的看法。必须承认,本科生人数的增加的确是催生考研族的一大原因,但是否是主要原因呢?似乎并不正确,毕竟目前我国也有着庞大基数的职业教育学生,但并未见高职学生“升本”的热情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笔者看来,考研族规模日益膨胀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目前本科教育定位的不清晰。目前,我国对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生的定位主要是指从事科学研究,而职业教育则面向市场,培养职业技术人员。相比之下,本科教育则有些“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本科毕业生还没有能力胜任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而在传统观念下,他们又不太甘于从事某些纯技术工作,这其实也是本科毕业生所谓“结构性”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说,考研族数量的激增本身或许并没有对错之分,但的确提醒有关方面对于本科教育定位问题应该加以重视。

高校对此没有相关规定并不奇怪,毕竟“代课”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且这种行为相对隐蔽,学校和老师如果不注意,平时也很难发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就不值得引起警觉。

从某种角度说,“代课”现象是“前课”现象的

日前,有杭州地方媒体报道了当地多所高校出现大学生花钱雇人上课现象,一节课20元~50元不等。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很多高校对于“代课”和“前课”都有明文规定,但针对学生找人“代课”却并没有相关规定。

高校对此没有相关规定并不奇怪,毕竟“代课”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且这种行为相对隐蔽,学校和老师如果不注意,平时也很难发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就不值得引起警觉。

从某种角度说,“代课”现象是“前课”现象的

在本月召开的两会上,

针对校园贷问题,有代表委员建议推动正规金融机构尽快补上高校金融服务短板。而据统计显示,目前国内高校校园贷的规模已经突破了800亿元。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一方面高校有着巨大的金融服务市场,另一方面,正规的金融机构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需要外部的推动。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解释——正是因为校园群体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能力,这才导致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望而却步。

以信用卡为例,事实上,从2002年起,商业银行曾较大力度推行过大学生信用卡,但产生了很多学生过度透支、家长被迫还债等事件。出于审慎监管原则,2009年后监管方大幅度提高了学生信用卡发卡门槛,此后商业银行基本退出了校园信用卡市场。

学生还款能力弱是一个事实,校园金融有着巨大的需求也是一个事实。同时,如果正规金融机构不介入,非法金融机构必然乘虚而入,这几乎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正规金融机构进入校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而是保护高校学生的一种必然选择。但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护正规商业机构的经济利益,却需要政府做更多的工作。

高校“代课族” 最高收费50元

日前,有杭州地方媒体报道了当地多所高校出现大学生花钱雇人上课现象,一节课20元~50元不等。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很多高校对于“代课”和“前课”都有明文规定,但针对学生找人“代课”却并没有相关规定。

高校对此没有相关规定并不奇怪,毕竟“代课”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且这种行为相对隐蔽,学校和老师如果不注意,平时也很难发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就不值得引起警觉。

从某种角度说,“代课”现象是“前课”现象的

“升级版”,两者都是学生逃避上课的行为,但前者用一定数量的金钱,“购买”了一份“安全”。而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在校园流行,原因无外乎三个:一是学生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已经不在乎这些“小钱”;二是学生越发忌惮学校和老师对旷课行为的惩罚力度;三是老师的课程已经越发缺乏对学生的吸引了。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看,这三种原因哪一种都不是“新闻”了,之前早有媒体对此进行过报道。其实,商科热并不难理解,毕竟在大部分人眼中,商科属于“工作体面、薪酬高”的职业。然而,大量的学生报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供大于求,反而造成就业困难。

在这里,我们需要反思的并不是目前商科热所造成的就业困难,而是我们的留学生在留学之初,是否存在太强的“功利心”。换言之,中国留学生远赴国外求学,究竟是兴趣使然,还是功利心驱动。对此,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留学生的年龄并不大,对于未来缺乏自己的判断。因此,诸如专业选择的问题常常参考家长和社会的意见。那么,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在面对留学问题时,是否能够真正从学生的需求和兴趣点出发呢? (陈彬)

超4成留学生选商科专业

近日,有媒体报道,根据统计,在中国的意向留学生中,有41.2%的人选择就读商科,稳居最受欢迎留学学科第一位,其占比远超工科、文科、理科等学科门类。与此同时,据《中国学生商科留学报告》中的调研数据显示,超过50%的被调研者认为找工作“有些难”和“非常难”,仅有5.56%的学生认为找工作“不太难”。

国内留学生大量选择商科就读已经不算是一则“新闻”了,之前早有媒体对此进行过报道。其实,商科热并不难理解,毕竟在大部分人眼中,商科属于“工作体面、薪酬高”的职业。然而,大量的学生报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供大于求,反而造成就业困难。